

周日走进华漕镇王泥浜村,好像走进了儿时的记忆里。在这个难得的休息日,外来打工的女人们睡个懒觉后起来,开始没完没了地洗洗涮涮。地上东一块西一条水迹,空气中到处荡漾着湿润的气息,阳光里都透着干净的洗衣粉味儿。

最初从万州到上海,直达的只有船,整整6天的船期,从长江头晃到长江尾。来的时候还是小姑娘,现在不知不觉鬓已微霜,算算时间,在上海竟20年了。寄居在华漕的这些万州老乡,掰起指头数数,惊着、笑着,又摇摇头。

摆起龙门阵

俞从云顶着一头半干的及腰长发,带着质朴的笑容,到隔壁老乡许远琼家串门,7岁的女儿程艺像个小尾巴一样,蹦蹦跳跳地跟着她。俞从云是许远琼堂姐夫的妹妹,她们是重庆市万州区白土镇五龙村人,在这里住的几户万州人家,都是同村的亲戚。

听到摆龙门阵的声音,旁边的张定菊和石廷均也慢悠悠地梳着头走过来,自己找张凳子坐下。张定菊是许远琼老公的表嫂,石廷均是许远琼的二嫂。定菊的模样,一看便有些富庶人家的感觉,二嫂白白净净的,像个读书人。

四个女人都在古北一带做家政。她们说,华漕一带的村子,是离中心城区最近的,房租便宜,一间在300-600元左右,去到家政服务需求量的古北也还算近便,骑电瓶车40分钟左右即可。最早来上海的时候,还住得离城市中心更近一些,这些年随着不断拆迁,她们的落脚点也一点点向外移。这些外来打工者的“家”,大多数时候是跟着拆迁被动地迁移的,四个人聊起,前不久曹杨市场拆了,很多人转到这里租房子,租金怕是又要涨了。

川妹子喜欢留长头发,几个人都是浓浓密密的头发,周末起来,第一件事是把头发仔仔细细地洗了,散开来晾着,然后去忙活别的事。姐妹几个商量着,下午去南华街上逛逛,那是离她们最近的商业街,相当于这一带的“南京路”,东西也便宜,符合她们的心理定位。

移民村风情

春末的阳光洒在巷子里,拉起的晾衣绳上渐渐挂满湿漉漉的衣服,几个小孩不顾衣服在滴水,在绳下猫着腰穿来穿去地玩耍。

许远琼的丈夫又不在家,记者来了5回,只有第一次晚上见过他一次。村落里的夫妻俩往往如此,一个上白班,一个上夜班,丈夫清早回来了,妻子又要走了,赶着脚地干活,见面聊天成了一件奢侈的事。12时许,远琼也收拾好东西,骑上电瓶车出门了,她的休息日是周六,所以总没时间和姐妹们多耍一会。走的时候,她招呼大家继续在她家坐着,留下了钥匙。

从万州那个村落迁移到上海的这个村落,她们保持着农村生活特有的亲情和信任。

华漕一带的“移民村”,是跟着外来务工者的脚步形成的。村里一户本地人回忆,2000年前后,华漕的农民没有了土地,开始以出租民房为生。事实上,比这更早便有外来务工者在此地租房居住,那时每间的月租金只有150元。慢慢地,村民们都看好这个省力的赚钱办法,纷纷盖房出租。他家2005年花4万多元造起一幢2层的水泥小楼,



■ 晚上回到狭小的家,和家人朋友挤在一起聊天看电视就算一天的休闲了

保姆村的周末

本报记者 姜燕/文 周馨/摄

2008年又用6万多元盖了现在这座外立面贴了漂亮墙砖的4层楼。加上家里的老房子,每个月租金收入不菲。

村里原来一条用来洗衣服浇灌的小河,现在成了最美也是唯一的景观,狭窄的沿河路上一溜烟开着些小超市、菜店、熟食店。小河尽头一处略宽的平台,是外来村民们交际的广场。无论什么时候,总有人或站或坐在路边,抱着孩子和旁人聊聊天,来来往往的常是相识的老乡,不同的家乡话在河边交错着。

22年的变化

俞从云今年39岁,在上海生活了22年。22年里,变化最大的是交通,原先到上海直达的只有船,后来船反倒要换乘了,现在来来去去大多是坐长途卧铺客车或者火车。另一个变化是老家人几乎全搬到上海来了。她父母已逝,兄妹三个,姐姐在七宝那边,哥哥嫂子以前也在上海,前不久因为要照看孙子,回老家去了,儿子留在上海,在江桥万达广场当保安。

不过,虽然都在上海,离得也挺近,但往来的次数少得可怜。这实在有点无奈,在上海各有各的事情,每天忙得不得闲,各人的休息日又不一定相同,除了年节和需要帮忙的时候,确实难以相聚。

她17岁的儿子还在老家,书读不下去,在一家饭店当服务员。女儿程艺本来也在老家,这次春节吵着要跟妈妈来,才带出来了,在村里一家民办的“希望”幼儿园上大班。家

里只有爷爷,照顾起来也不方便。所以,为了照看女儿,俞从云只能做两家家政,一个月收入只有3000多元。她丈夫程启群在虹桥机场当保安,月工资也只有3000多元。这点钱,俞从云颇为不满,“五六千元钱,够干什么用,每个月生活费就要2000多元,还不算房租。”夫妻俩的生活本来不错,在川沙一家制塑厂做了8年,厂里给农工商超市做马甲袋,包吃包住。丈夫是包工头,厂里的工人都是他从老家带出来的,可前几年政府出了限塑令,又碰上拆迁建迪士尼,厂关掉了,两人才不得不撤到这里。丈夫的脑子到底活络,不久前刚和人合伙各掏6万元订了一辆厢式货车,挂靠在一家货运公司,准备跑运输。

半年做生意

听说隔壁一个万州亲戚在村旁的路边开了一家川菜馆,记者邀请她们一同去饭店吃饭,省得做饭,但几个人都笑着不肯去。石廷均说中午她有老乡来,不如就去她家里吃,她去河边上的卤菜店买点熟食。

她说的卤菜店就是张定菊家开的。张定菊的丈夫谭登全今年42岁,在这群老乡里算年龄大的,来上海也最早,1989年便在金沙江路一带做建筑当小工,每天5元钱。这些年挣的钱,人家都回家买房,他没买,花十几万元买了一间门面房。

3年前,他搬到这里,起初跑快递,后来看到妹夫做生意,隔壁也有老乡开起了饭店,他也动起了脑筋。在村里小河边的“商业中心”——有

几家小卖铺、小吃店和菜店的地方,以每个月1500元的价钱租下一间门面房,又掏5000元学费,到武汉学了做卤菜的手艺,回来开了家卤菜店。夏天卤菜生意好,他只做夏天一季,4月左右开张,10月关门,能赚不少钱。谭登全干活是把好手,一个人能烧起十多个人吃的饭菜。每天凌晨5时许,他便起来去菜场进货,猪肚、猪耳朵、鸭脖子成箱运回来放冰箱里,架起几口锅开始煮。村里白天没什么人,中午卖得少,晚上9时以后,大批的人回到家里,排着长队买他的卤菜,他一个人连做带卖,都来不及。老婆张定菊做家政回来,也赶来给他帮忙。

不做卤菜生意的时候,他就继续跑快递,一个月挣4000多元。两个人拼命挣的钱,要付在老家读书的两个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,大的读高中,每月1500元,小的读初中,也要500元。夫妻俩生活费不算房租每个月2000多元,为了次年的生意,冬天门面房闲置着并不退掉,1500元的房租也还是要交着。这样算起来,剩的真是不多。

谭登全全家里外是把手,知道疼老婆,张定菊和姐妹们去逛街,他一个人在家,洗着一大盆衣服。

小新上海人

说话间,一个清秀的小妈妈抱着个小毛头冲进许远琼屋里,坐在凳子上便拉过垃圾桶给宝宝把尿。她是石廷均的弟媳,今年22岁,刚到上海2年。

小毛头才5个多月大,长得的

像妈妈龙兴燕,是个英俊的小男孩,可右耳却是天生残疾,耳廓没有长出来,只有一个小手指指节大小的小肉球。在孩子即将出生的那一天做B超,龙兴燕才知道儿子有残疾,此前,她只在儿子三四个月大的时候,去华漕卫生院做过一次B超,当时检查胎儿一切正常。从那以后直到生产前,她都再没做过产检。

“听说产检一次要几百元呢,第一次化验的项目特别多,要1000多元钱。”龙兴燕还听说产检每个月要固定去检查,要生之前每个星期都要去一次,想着孩子在她肚子里长得好好的,应该没事,用不着去检查。她怕花钱,夫妻俩年轻,挣钱不多。她20岁才从老家重庆市万州区新田镇马家村出来,先是在上海闲了几个月适应环境,后来才在青浦一个厂里做工,没做多久就怀孕了,此后一直在家,丈夫挣的钱就那么多,能省的钱最好就省了。

孩子是在闵行区的浦江卫生院生的,很多外地打工的人都在那生孩子。

农村人的生活态度被带到了城市里,他们习惯了遇山翻山、遇水过河,儿子的残疾是个事,可愁也没用,她年轻的脸上倒是淡定的。她想在儿子三四岁的时候带他去医院看一下,争取让他以正常人的面貌走进校园,不留下心理阴影。

“他是这里最小的新上海人呢。”几个女人笑着,把这孩子抱来抱去地逗着,言语间流露出的模糊的身份认同,在她们交互的眼神中轻轻一击。